

文史资料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第五十辑 (总第一五〇辑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

ISBN 7-5034-1293-3



9 787503 412936 >

ISBN 7-5034-1293-3/K · 0885 定价: 15.00 元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五十辑（总第一五〇辑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史资料选辑. 第 150 辑/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.
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2.12

ISBN 7-5034-1293-3

I. 文… II. 全… III. 文史资料—中国 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7527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华正印刷厂

装 订: 北京华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8.5 字数: 219 千字

印 数: 3500 册

版 次: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委会

主 任	朱作霖				
副主任	刘 恕	刘济民	李东海	吴 福	宋 堃
	金开诚	金冲及	龚育之	张文惠 (常务)	
委 员	王庆成	王晓秋	王楚光	刘景录	李汉秋
	陈 威	陈 砾	陈漱渝	周秉德	弥松颐
	傅璇琮	舒 乙	党德信	马 威	胡太春
	俞兴茂	霍明光			

本辑执行编委 张文惠 俞兴茂

本辑执行编辑 潘志军

目 录

民主斗争

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艰苦斗争	周新民 (1)
从民建发起到“较场口事件”	林涤非 (8)
回忆旧政协会议期间的民建会	范尧峰 (21)
“较场口血案”中的劳协	叶维民 范振声 (29)
重庆“较场口事件”见闻及其前后	钟复光 (48)
我参与审理“较场口血案”	汪 廉 (57)
张澜先生在重庆	沈自强 (73)
鲜特生的“民主之家”	吕光光 (79)

民国政事

重庆“二二八”事件纪实	陈文荣 (96)
参加国联讨论日本侵华的几次会议的回忆	王家楨 (117)

抗战纪实

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与山东抗战	张友渔 (139)
回忆抗日战争二三事	张素我 (145)

七七事变回忆	徐逸樵 (150)
流亡万里到渝州	伏笑雨 (153)
记举世闻名的一条空中运输线	赵 新 (170)
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役纪实	周郁谋 (179)

军事史苑

国民党军窜犯东山岛遭到惨败的经过	陈士彦 (222)
中央军事慰劳团简介	刘子英 (230)

人物述林

纪念二伯父孔祥柯	孔令仁 (243)
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	唐绍明 (247)
男女平等的先驱——黄炎培	曹淑瑞 (257)
杜聿明与东北中正大学	焦实斋 (260)
于右任为什么从重庆出走成都	高一涵 (264)

民主斗争

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艰苦斗争

周新民*

旧政协会议举行前，民盟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会上除制定盟章、政治纲领和增选中央委员以外，还提出呼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组织民主联合政府，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三大问题。

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不久，国民党即破坏《双十协定》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，调动所有军队到交通要道，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。民盟主席张澜于1945年12月30日分函国、共两党，希“于1946年元旦，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，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”。1946年1月10日^①，民盟中央发言人对时局发表重要谈话，首先提出停战问题：“（一）赞成停止军事冲突，同时恢复交通，但一切军队，应各驻原地，不能利用铁道调动军队。（二）军事考察团除由国共两党代表参加外，我们赞成由政治协商会议公推社会公正人士组织之。其人选不限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。（三）我们曾建议国共两方于元旦宣布停战，现既未能做到，政府所公布之办法，我们主张能照以上所修正之点于协商会议开会以前做到，以慰国人之望。”

* 作者当时系民盟中央委员。

① 《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》记载的时间为1946年1月2日。

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，不得不于旧政协开幕之前两小时签发了停战令。

旧政协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，青年党公开投靠了国民党，与民盟处于对立地位。民盟组成以张澜主席为首的代表团，自参加旧政协会议之日起，始终与中共代表团站在一起，互相配合，这是民盟同中共的第一次公开合作。

旧政协会议开幕时，由沈钧儒代表张澜主席致词，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，是求国内的和平和政治的民主，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。其次，谈到八年的抗战，人民大多颠沛流离，无食、无衣、无住，急需解决当前复员与救济这些问题。第三、要解决实行开放政权，订定共同纲领，召开国民大会，以及制定宪法，实行宪政等等问题，首先不能违反人民普遍的愿望，要在会议中求得公平合理的结果。最后他谈到，先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抗战胜利，我们只有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，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，才对得起死难的先烈和全国人民。

民盟在旧政协会议中提议很多，详载“政协文献”，其中最重要的是：（一）实践诺言，迅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。（二）制定和平建国纲领。（三）重选国民大会代表。

在会议举行的最后一次综合小组上，民盟代表团还提议：（一）解决东北善后问题。（二）释放张学良、杨虎城等“政治犯”。（三）制定侵害人民自由治罪法。（四）延长政治协商会议到宪法实施。

旧政协会议的重大成就，就是通过政府改组案、国民大会案、和平建国纲领案、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案。这五项决议案的通过，是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，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及其内战政策，否定了国民党的法统，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，国民党的政治失败。

旧政协会议闭幕不久，国民党即于1946年二三月秘密召开二中全会，首先否认了旧政协决议，并批评国民党出席旧政协会

的代表邵力子等，随即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内战。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后方，还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民盟的活动，使民盟在半年中遭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其中主要有以下事件：

一、重庆“较场口血案”

旧政协会议期间，重庆市民组成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，经常在沧白堂开会，邀请民盟和社会贤达出席旧政协会的代表报告会议经过，国民党特务经常去捣乱，造成“沧白堂事件”。1946年2月10日，又制造了较场口血案，当日重庆市民在较场口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，国民党预先派遣大批特务分布会场。民盟中委李公朴刚上主席台宣布开会，特务即破坏会场，将李公朴从主席台上拖下来，并以铁锥子刺伤其头部，郭沫若、施复亮等亦均受伤。

二、反苏游行

1946年2月22日，国民党为制造反苏、反共、反民主的气氛，污蔑苏联在东北“侵犯中国主权”，在重庆发动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，号称二十万人，将中共的《新华日报》社、“新华书店”和民盟的《民主报》社全部捣毁，并殴伤工作人员多人。当时“新华书店”所有书籍悉被撕成碎片，沿街约有五里路长到处都铺满了纸屑。同时，国民党在成都亦纠集一部分三青团人员发动了反苏游行，捣毁了“新华书店”成都分店，并在四川大学制造了“诬害三教授事件”，即诬害李相符、彭迪先、陶大镛三教授。

三、西安“李敷仁、王任惨案”

民盟中委李敷仁是西安社会教育家，工农群众都尊他为老师。国民党特务以其思想进步，1946年4月30日秘密加以逮捕，用黑布将他的双目蒙罩，押到郊外枪杀。李敷仁身中三枪未死，滚入泥沟里，幸而农民听到枪声奔来抢救，发现是李老师被杀，大吃一惊，立即将他抬至农村，藏在农民家里，后来掩护送到延安医愈。民盟中常委杜斌丞发行的《秦风工商日报》，于1946年

3月1日被国民党特务捣毁，西安名律师王任自告奋勇出任该报法律顾问，严正斥责特务暴行，于4月1日被枪杀。同年5月3日，该报在特务纵火、投慢性燃烧弹之下，被迫停刊。5月29日民盟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抗议，要求追究责任，惩办祸首。

四、南京“下关血案”

1946年6月23日，上海十万市民举行大会，欢送民进主席马叙伦率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请愿。请愿代表团刚抵南京下关车站，即被国民党特务围攻达五小时之久，代表们多受重伤。叶笃义前往迎接亦被殴打。女记者浦熙修等往采新闻，不只被打，全身衣服还被其撕毁。

五、昆明“李、闻惨案”

民盟中委李公朴、闻一多因在昆明领导民主运动，早为国民党所仇视。蒋介石为配合前线军事行动，密令国统区各大城市的特务机构严密镇压民主运动。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接到密令后，曾两次电报请示，蒋下令“得权宜行事”。霍揆彰即大胆放手，布置一切，于1946年7月11日晚10时指派特务，以美制无声手枪在学士坡暗杀了李公朴。同月15日下午5时，又在西仓坡枪杀闻一多。

“李闻惨案”发生，在国内外引起普遍愤慨，民盟中央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，并派梁漱溟和我赴昆明调查其真相。国民党当局以一切安排尚未就绪，多方阻挠和拖延，使我们不能早日前往。同时，昆明民盟同志以当时环境险恶，对我十分爱护，曾来电劝阻。我以组织已经决定，李、闻两烈士又和我久共患难，不能畏难不去。我们于8月3日起程，国民党当局派秘书张寿贤陪同我们，从南京途经重庆，6月始抵昆明。我们刚下飞机，住在“商务”酒店，即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，行动失去自由。我们在昆明住了16日，只有王健（李公朴的女婿）、高学逵（《大公报》记者）、曾雨峰（滇新银行职员）等来看过我们，其余老友多不敢来。每次客来，特务在旁边作记录，甚至吃饭和

睡觉时也有特务从旁窃听我们说些什么。我们到昆明的第二天，《中央日报》发表文章，认为梁漱溟为人公正，大捧一场；周新民成见太深，大骂一顿，其目的就是警告我。当时他们指责我的事实，就是我经过重庆时，正值重庆各界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，我去参加公祭，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和到会大众都要我说几句话，我在说话中指出在陶先生死前，上海有一个 18 人的黑名单，第一名就是陶先生。他知道迟早要出问题，所以加紧努力工作，白天为育才学校筹款奔走，夜间为整理自己著作不睡，以致忧劳过度，突患脑出血而逝世。他表面上死于病，实际上是死于国民党特务之手。我说这些话明明是有根据的，《中央日报》却指责我成见太深。

我们到昆明后，国民党当局对我们采取冷淡和孤立的策略。延至 8 月 9 日，顾祝同始同我们见面，劈头就问我：“你是否在大别山搞过？”我答以曾参加过大别山的抗日工作。顾祝同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呢？因为我从 1938 年春在大别山主持安徽省总动员会组织，在中共的领导下组成了 52 个县动委会、72 个工作团（直属的 42 个、县属的 30 个），共有青年干部二三千人，国民党想尽方法夺取这个力量，终未达到目的，乃集中目标打击我，我于 1939 年 6 月被迫离开大别山。后来这批青年干部都去了新四军，国民党认为这是我“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罪行”，在重庆、巴东、老河口等处均控告我。因此，我和顾祝同初见时，他即提出这个问题，显系有意吓唬我。

我们到昆明后，首先代表民盟慰问李、闻两家烈属，并拜访楚图南、冯素陶、尚钺、潘大逵等，他们定于次日离昆，留冯素陶帮助我们。可是我们每次出去，均无交通工具，又有七八个特务跟着，弄得我们无法活动。后来我向梁漱溟建议说：“这个政府对你好些，请你专门应付它，我来设法进行调查。”梁漱溟说：“特务时时跟着你，你有什么方法去进行调查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在昆明工作过三年，路线和人事都熟悉，特务虽然跟着我，我还可

找机会去活动。”后来即照这样分工。我第一次单独去云大医院慰问闻夫人和她的儿子闻立鹤，有四个特务跟着我，但他们未进医院大门。我慰问闻夫人母子后，立即从医院后门走到云南大学，约集进步学生开会密谈，将搜集材料的线索和步骤安排好，并鼓励他们早日完成任务。会后我回到商务酒店，那四个特务还未回来，可能在医院大门外等着我。从此，我每天出去，常设法把特务丢在后面。

我们正在调查中，顾祝同和卢汉于8月13日约我们吃晚饭，饭后顾祝同请梁漱溟至别室小谈，说李案凶犯未获，闻案15日可“公审”，请参加观审。他们所谓的“公审”，事实上就是假审判，所谓观审就是旁听。霍揆彰收买李文山、汤时亮为假凶犯，演习多日，始进行假“公审”我们曾复函不同意这样办，但为彻底了解其丑恶，又不能不借观审去察看。在“公审”的时候，既无人证又无物证，只是法官和假凶犯一问一答，完全是在演滑稽的丑剧。我们观审完毕，立即去函提出种种疑问，认为完全是假审判。当时我们还怀疑他们将要演习假执行，果然，在我们离开昆明不久，宪兵第十三团于8月26日在昆明车站外三公里公路旁贴了布告，说要枪决闻案凶犯，但沿途戒备严密，在两小时内不许行人通过，使人无法看见被枪决者是谁。当时有人参与其内幕，亲往刑场观看两具替死鬼的尸首倒卧在地上，并非是“公审”堂上的李文山、汤时亮。这也和处决“一二·一”惨案的凶犯一样，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真是“无事不弊”了。

经过十天的调查，材料多已到手，我整出两份，由梁漱溟和我各带一份。这时候忽接到一封密信说：“你搜集的材料多靠不住，我在云南警备司令部工作，掌握了李、闻案的全部材料，你如能介绍我携眷赴延安或者给我3000万元，请你到某处面谈，我可将全部材料给你。”当时我同梁漱溟商议，认为其中一定有阴谋，故置之不理。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，幸得云南大学进步学生大力帮助，才能搜集得各种证据，发表了《李、闻案调查报告

书》，向全中国、全世界正义人士控诉国民党的罪行。

六、成都血案

张澜主席和成都各界得知李、闻被国民党杀害，极为愤怒，订于8月18日在成都“蓉光”电影院举行李、闻两烈士追悼会。国民党特务即在会前散布谣言，多方破坏。到了散会时，忽有人高呼“打倒民主同盟”，“打倒共产党尾巴”，“打倒张澜”等口号。张澜主席刚走出会场，又有人向他投掷包裹着玻璃碎渣的小包和装有红色药水的玻璃瓶，击伤他的头部三处，血流如注，面部胡须及上半身均是血迹。大会职员张松涛亦被殴伤甚重。民盟四川省支部于1946年8月20日曾为此案向川康当局提出备忘录，实际上就是抗议。

（1964年）

从民建发起到“较场口事件”

林 涤 非*

重庆民主运动的兴起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，博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种和平姿态，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。在这种形势下，重庆的和平民主的气氛更为活跃。

我记得首先是由冯玉祥和李济深两位将军，发起一个上书蒋介石要求“党内民主”的签名运动，提出十大具体要求，其中最使蒋介石感到头痛的两点是：（一）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。（二）立即解散一切特务组织。但国民党一直都在“蒋家天下陈家党”的控制之下，一般国民党员只有缴纳党费的义务（规定由会计于发薪时扣除），而无发言的权利，加之 CC 特务横行，谁也不敢签名而惹祸遭灾。只有极其少数国民党左派人物，才不畏风险响应签名运动，如陈铭枢、谭平山等人是热烈响应，签名于头十名之内的，其他的人我就记不清楚了。我和王葆真是同时签名的，大约在二三十名之后，一共究竟有多少人签名亦无从知道。

听说这封签名信由冯玉祥亲自交给了蒋介石，自然触怒了蒋介石，后来他就派冯出国考察水利，并派一艘军舰、一排士兵，名为护送赴沪，实即押送出境。行前我们在重庆陕西街贵州省民

* 作者曾任重庆“和丰”银行协理兼秘书长，系民建总会首届理事。

行聚会，由王葆真出面设宴为冯玉祥饯行，并由王葆真去邀谭平山，我去邀陈铭枢两位作陪。但冯因故未来，谭、陈两位亦因事未来。王葆真介绍我与黎季云、黎又霖兄弟及李国珍（亦签名人之一）认识。

在此以前，王葆真曾告诉我说，蒋介石把李济深请到重庆来，是想利用他统率桂系军队打共产党，给他“剿匪”总司令的名义，李却不肯干。席间李济深说他送冯玉祥到上海后，自己就去香港，准备将来发起成立一个国民党内的革命组织，要我们在后方响应，不要因为这次签名运动受了一点挫折就消沉起来。

毛主席亲来重庆和谈，将重庆的民主运动推向一个高潮，一时间组织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声浪，不绝于耳。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人，都想组织一个新党，如章士钊想组织一个政党，曾邀我参加过两次非正式的筹组会议（他曾做过我筹办二岩煤矿公司的法律顾问），但两次到会的都不满十人。章上钊没宣布组党派的目的和名称，只说经济上有办法，要大家不必顾虑，也不要害怕风险，大胆放手发展组织。我从旁一打听，原来他是“奉命组党”，并已定名为“农民党”。我想这种党派与我们组织的党派目的不同，以后我就没有再去，下文如何也不得而知。这也算是我亲身经历重庆民主运动的一支小插曲，故尔一谈。

民建会发起组织过程中的一鳞半爪

在民主建国会（简称民建）发起组织之前，我也和其他从事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，想为民主运动增加一点力量，曾和范尧峰等人组织了一个政治小团体叫做“九九联谊社”，这是因为9月9日是中国在南京正式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大喜之日，所以我们就将社名叫做“九九”。

当时我是重庆“和丰”银行协理兼秘书长，我的办公室便作为暂时集会之所。我们每隔三天集会一次，主要是交换时局动态

和讨论发展组织的计划。我曾想过一个天真的发展组织的办法，叫做“九九连环组织法”。办法是以九人为一小组，每人各负发展九人之责，发起人担任小组联络召集人，这样一环套一环地发展起来，比较容易收到快速壮大之效。但大家认为这样过于呆板，不如自由发展的好。记得我们集会时间很短，次数不多，发展人数也不多，大约不到二三十人，大都是中层知识分子和工商界、银行界的从业人员。

就在这时，范尧峰陪同孙起孟邀我参加民建组织，当我听说民建会是以黄炎培为首发起组织时，就毫不犹豫地同意参加。因我知道黄炎培社会声望很高，他为了和平民主运动，不辞辛劳不畏风险，往来于重庆、延安之间，深孚众望。由他出面组织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政党，是有很大大号召力的，也是很有前途的，加之我和黄炎培有过旧谊。

我和范尧峰初步决定参加民建会，我又去“华康”银行找李国珍商量，恰遇施复亮正和该行协理鄢公复谈话。施复亮见了我很高兴地说“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想找你，想邀你和公复参加‘民建’，公复已同意，你怎么样？”我笑着回话：“那当然没有问题，您都迟了一步呢，昨天孙起孟已来邀我参加了，我不仅个人参加，还准备把我这个小团体的人一起介绍参加，我们的小团体成不了大事，还是跟着你们来吧！”

由于施复亮的相邀，加快了我参加民建会的决心与步伐。两三天后“九九联谊社”座谈时，我就征求大家意见，是集体参加呢，还是自由参加呢？大家认为原则上采取自由参加方式，表示希望大家都参加。当场表示参加的有王之浩、胡景文、李国珍、仲九华、高询侯等人，随后继续参加有“巴蜀”中学总务主任沈景岳等人，其他的人就不能一一记清楚了。大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民建会，“九九联谊社”也就宣告解散，把力量转移到民建会来了。我原想把所有的“九九”成员统统介绍加入民建会，但一些人有顾虑，特别是银行界的朋友，更是畏首畏尾，甚至已